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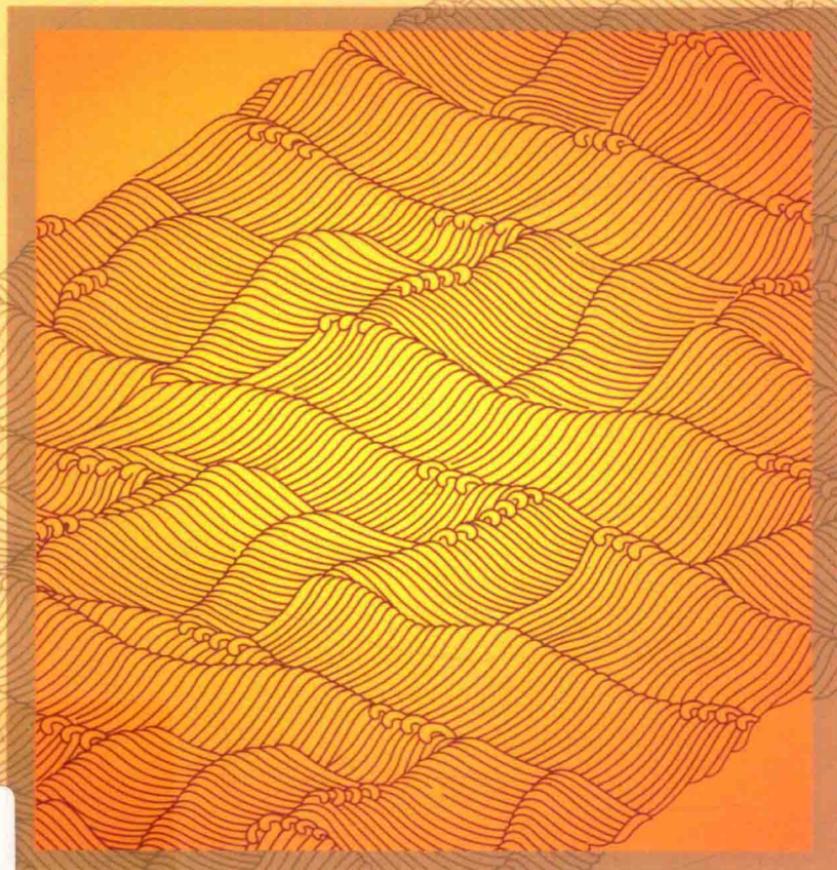
大陸學者叢書 17

宋如珊·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編

(1917~1937年)

程光燁、劉勇、吳曉東、孔慶東、郜元寶 合著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編

(1917~1937年)

本書描述了1917~1937年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對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文學流派和作家作品均進行了詳細評論。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發生的文學現象，因此，它的主題、題材、創作風格無一不體現出社會轉型中的矛盾和問題；與此同時，這些矛盾和問題，也反映了本時期中國作家對歷史和社會的思考，對人生命運的審美體驗與想像。

ISBN 978-986-221-435-0



9 789862 214350 00490

建議分類 語言文學/評論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編

(1917~1937年)

程光燁、劉勇、吳曉東、孔慶東、郜元寶 合著

大陸學者叢書 CG0017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編, 1917-1937 年 /
程光燁等合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
科技, 2010.04
面 ; 公分. -- (大陸學者叢書 ; CG0017)
(語言文學類 ; CG0017)
BOD 版
ISBN 978-986-221-435-0 (平裝)
1.中國當代文學 2.中國文學史 3.文學評論
820.908 99004883



語言文學類 CG0017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上編 (1917~1937 年)

作者 / 程光燁、劉勇、吳曉東、孔慶東、郜元寶 合著
主編 / 宋如珊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10 年 4 月 BOD 一版
定價 : 49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總序

1992年，兩岸開放探親後的第五年，我在埋首撰寫論文〈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過程中，驚覺對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投入成果，並在種種因緣之下，開始關注對岸文學，一頭栽進大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多年來，心中一直記掛著應該把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情況也整理出來。因為台灣和大陸是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兩大陣地，除了兩岸學界的本土文學研究之外，還須對照兩岸學界的彼岸文學研究，才能較完整地勾勒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樣貌。去年，我終於把這個想法，部分地呈現在〈台灣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觀察〉一文中。但是，這個念頭的萌發到落實，竟已倏忽十年，而在這期間，仍有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尚未完成，不禁令人感慨韶光的飛逝和個人力量的局限。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兩岸都因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日益開放多元；近年更因大量研究者的投入，產生豐盛的研究成果，帶起兩岸文學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岸的研究者，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成長，但透過溝通理解、互動砥礪，時時激盪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火花。

「大陸學者叢書」的構想，便是在這樣的感慨和讚嘆中形成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成果的交流 and 智慧的傳遞，是兩岸文學界最有意義的雙贏；於是我想，應從立足台灣開始，將對岸學者的文學研究引介來台，這是現階段能夠做也應該做的努力。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存在著難以克服的主客觀因素，台灣出版界的不景氣，更提高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度。

感謝秀威資訊公司的總經理宋政坤先生，他以顛覆傳統的數位印製模式，導入數位出版作業系統，作為這套叢書背後的堅實後盾，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使「大陸學者叢書」能以學術價值作為出版考量，不受庫存壓力的影響，讓台灣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彼岸的優質學術論著。在兩岸的學術交流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會是一個美好開端。

宋如珊

2004年9月 於士林芝山岩

目次

總序	i
緒 論	1
第一節 文學啟蒙的意義	2
第二節 對啟蒙的冷靜反觀	8
第三節 國家現代化與文學的新要求	15
第四節 現代化的中斷與變異：中國現代文學前、 後期的形成	20
第 一 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	29
第一節 「發生」的概念	29
第二節 近代知識界的形成	33
第三節 「白話」的興起	39
第四節 近代詩文界的「革命」	51
第 二 章 文學革命與白話文學	59
第一節 文學革命	59
第二節 新文學初期的理論建設	66
第三節 文學社團與創作傾向	72
第四節 早期白話文學創作	78

第三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者——魯迅	85
第一節 魯迅出現的意義	85
第二節 《吶喊》、《徬徨》和《故事新編》	93
第三節 《野草》和《朝花夕拾》	105
第四節 雜文	114
第四章 多種小說形式的探索	127
第一節 郁達夫與「自敘傳」抒情小說	127
第二節 五四時期的抒情小說	135
第三節 鄉土小說的流脈	142
第四節 「為人生」的小說	147
第五章 現代散文的建立和發展	157
第一節 「隨感錄」所開創的雜文	157
第二節 周作人與美文的倡導	163
第三節 朱自清、冰心等人的散文	169
第四節 報告文學的興起與演變	175
第六章 新詩流派的多樣化探尋	179
第一節 「鳳凰之再生」——郭沫若和《女神》 ...	179
第二節 小詩派與湖畔詩人	184
第三節 「戴著腳鐐跳舞」 ——新月派詩人的追求	190
第四節 馮至及其他詩人	198

第七章 現代話劇的孕育與進展.....	205
第一節 文明戲與愛美劇.....	205
第二節 丁西林與早期獨幕劇.....	211
第三節 田漢、洪深與浪漫戲劇.....	214
第四節 夏衍與戲劇民族化的努力.....	221
第八章 曹禺與現代話劇藝術.....	227
第一節 命運悲劇——《雷雨》.....	230
第二節 《日出》、《原野》及其他.....	237
第三節 文明的輓歌——《北京人》.....	243
第四節 曹禺的戲劇觀及其影響.....	248
第九章 時代激流中的左翼文學.....	251
第一節 紅色年代的先鋒旗幟.....	251
第二節 激昂的左翼詩歌.....	261
第三節 浪漫化的革命小說.....	270
第四節 轉向寫實的左翼小說.....	274
第十章 現代派文學思潮.....	281
第一節 李金髮與象徵派詩人.....	281
第二節 戴望舒與現代派詩人.....	287
第三節 「新感覺派」小說的都市幻影.....	296
第四節 現代話劇的先鋒實驗.....	301

第十一章 茅盾、巴金及現代長篇小說	307
第一節 茅盾：冷峻理性的小說大家	307
第二節 巴金：燃燒青春與生命的作家	326
第三節 「大河小說」：現代長篇的新嘗試	334
第十二章 老舍與現代市民小說	343
第一節 老舍的文學史地位及創作生涯	343
第二節 京味文化的締造者	346
第三節 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	352
第四節 老舍小說的藝術成就	357
第十三章 沈從文及京派小說家	365
第一節 「鄉下人」與「城裏人」	366
第二節 用詩構築的生命牧歌	369
第三節 京派文化與京派作家	375
第四節 廢名的田園小說	382
第十四章 禮拜六派的通俗小說	387
第一節 雅俗格局的演變	387
第二節 一枝獨秀的民初五年	391
第三節 面向現代觀念的調整	399
第四節 與新文學比翼齊飛	406

緒 論

在 20 世紀中國社會痛苦焦慮、憂患不斷的歷史進程中，貫穿著一個「走向現代化」的總主題。這必然會深刻影響到「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的基本面貌和走勢，賦予它現代化的文化內涵及其歷史性格。正因為 1937 年抗戰的突然爆發，一度終止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把這個有紀年含義的歷史符號帶入 20 世紀民族的集體記憶之中，對文化結構和心理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格局似乎可以考慮作這樣的調整：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抗戰爆發，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前半期；抗戰爆發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則形成了它的後半期。中國現代文學始終是以 20 世紀中國的命運為前提、為指歸的，它既是社會大振盪、大陣痛和大調整的產物，也是中西文化大撞擊和大滲透的產物。正像社會歷史轉變的性質經常會呈現出複雜的形態一樣，中國現代文學現代化主題的延伸與變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必然會呈現出豐富多變的歷史面貌。

第一節 文學啓蒙的意義

啟蒙的歷史依據／在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現代化」
內涵的擴大

20 世紀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是自「中國中心論」的徹底破滅開始的。1840 年的鴉片戰爭成為這場全民族總危機的導火線，它後來又把中國帶入到災難深重的甲午戰爭之中。民族危機感對 20 世紀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造成了現代／傳統、新／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對立，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識份子中，則導致了激切變革的時代要求。它在思想理論上的重要收穫是嚴復譯的《天演論》，而它在社會體制方面的激進表現，是充滿啟蒙色彩的戊戌變法。如果說，是它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向了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在內的現代文學開拓者的文化和歷史的視野，不如說是賦予了中國現代文學最初的「現代化」的文學概念，從而奠定了現代文學的思想基礎。在戊戌變法以及「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等人的身上，兼有思想啟蒙與文學啟蒙的雙重色彩。可舉為用思想啟蒙的巨大車輪帶動文學啟蒙典範的，應推梁啟超作於 1901 年的《新民說》和另一篇重要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明確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梁啟超的突出貢獻在於，他把新文學提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高度，將後者置於政治、道德、宗教、人心、風俗和人格變革等社會改革的廣闊背景當中，把文學的現代化與社會、民族的現代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一思想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但也應看到，梁啟超君主立憲的保守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民族功利主義文學觀，也為後來現代文學的深刻矛盾與危機，留下了隱患。

文學啟蒙的工作意味著，人們將要在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做出自己的嚴峻選擇。最初力倡文學現代化的，是陳獨秀和胡適。1915年9月，陳獨秀在《敬告青年》這篇《新青年》雜誌實際的發刊詞中，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抨擊了傳統的文化觀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行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六項主張。稍後，他又和胡適分別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中，以「口語的」、「言之有物的」、而非「退隱的」、「山林的」等措辭，對現代與傳統的文學觀進行了二元對立式的劃分，鋒芒直接指向「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要求文學從對傳統文化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來，這對當時無疑有極重大的意義。如此激烈否定傳統、推崇現代性的文學品格，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上是劃時代的，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也是極為少見的現象。嚴格地說，陳、胡的言論只是上一階段譚嗣同、嚴復、梁啟超歷史工作的繼續。這實際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晚清以降的文學啟蒙，已開始由籠統

的倡導推進到實際運作的階段，文學現代化的理性思維正逐漸為思慮成熟的文學策略所替代。在自改良主義思想家梁啟超、康有為開始的文學變革和以魯迅、周作人為代表的「五四」文學的現代潮流之間，陳獨秀和胡適扮演了推波助瀾和輿論推動的角色。事實上，作為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群體中的一員，他們二人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國的文化傳統。胡適中年以後的「《紅樓夢》研究」、「《水經注》研究」，陳獨秀在晚年勉力進行的文字學研究，都充分證明了這種傳統文化影響的存在。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儘管現代／傳統的對立被一部分思想先驅看作了「東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嶺」¹，它的目的是通過對舊傳統採取過激的「評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²，但 20 世紀中國的民族危機感，不只是來自現代／傳統這種對立的關係，而且也來自對文學啟蒙本身的深刻懷疑。在激烈的反傳統態度中，一開頭便明確包含或潛埋著對士大夫固有傳統的體認。比如，文學啟蒙的目的重在國民性的改造，從而最後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面貌，這恰好說明它仍未脫離「以天下為己任」的憤世憂國的文化傳統；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論中顯現了文學啟蒙中現代化主題的內在複雜性和現代性。

把文學啟蒙思潮中的「現代化」內涵繼續擴充並極大地深化了的，是魯迅和周作人。雖然他們二人的思路是循著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兩個方面展開的，但顯然這種思考的重心更偏重於後者，即個人的現代化。1907 年至

¹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載《青年》，第 1 卷第 6 號。

² 《胡適文存》，第 4 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 年，1022-1023 頁。

1908年，魯迅在《中國地質略論》和《摩羅詩力說》中，鮮明地表露出希望民族、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態度，但又為之懷著深沉的隱憂：「中國人」會不會從「世界人」中擠出³。幾乎在此前後，他在論文《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中，又以施蒂納、叔本華、基爾凱郭爾和尼采的「個人」學說為哲學背景，把「人各有己，朕歸於我」作為通向「人國」的途徑，否定了一切外在於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專制」形式：道德、倫理、國家以及「世界人」和「國民」等類屬概念。周作人的《平民文學》和《人的文學》，對魯迅的上述思想做出了理論上的呼應。雖然和魯迅一樣，周作人熱忱地關注著對國民的思想啟蒙，但認為，個人精神世界的建設則更為迫切和必要。周氏兄弟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改造國民靈魂」的重要命題，極大地凸出了中國現代文學中「個人現代化」的內涵和意義，使之成為它後來發展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就不難理解，儘管魯迅始終是從「知識份子」和「農民」的角度思考改造國民靈魂的問題的。但無論在孔乙己、魏連役還是在祥林嫂、阿Q身上，他思考最深、憂憤最廣的仍然是個人生存的「危機」。雖然在文學發展的不同時期，這一命題在演進之中也產生過種種變異，在不同營壘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之間出現過諸多爭論，但基本思想卻支配並影響了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總體的發展。「五四」文學革命乃至抗戰爆發前的各種文學思潮，著重強調的是文學與社會改造的密切聯繫，文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啟蒙作用。魯

³ 參見《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357頁。

迅的「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⁴的文學觀，實際不僅在「五四」時期創造社作家，同時在 30 年代的革命作家那裡也得到自覺的呼應。在創造社作家「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中，包含著對文學的「社會影響」的重視。雖然革命文學對文學的社會作用不免有浮誇之辭，某些作品還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違背了文學創作的規律，但它的內核仍保留了改造國民性的色彩，比如張天翼、丁玲、葉紫就把文學啟蒙的對象集中於下層社會，把喚起大多數下層人民的覺醒作為文學的基本任務。在 30 年代，另外一些自由主義作家堅持與政治保持有距離的文學觀，認為「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問題，是大半由於人心太壞」⁵，卻不贊成「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他們關於「怡情養性」、讚美「原始人性」以及回歸自然的文學趣味和審美傾向中，依然保持著改造國民靈魂的內涵，同現代文學的基本信念是並行不悖的。以前大多數研究者較多注意到左翼文學與自由主義文學思想上的分歧，對他們同樣堅持文學啟蒙的共同傾向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尤其是用現成的政治性結論替代了對複雜文學現象細緻的考察和辨析，這就容易游離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啟蒙的發展主線，最終陷入認識論的誤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過去我們沿用了思想史界關於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思路，把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概括為「啟蒙與救亡的

⁴ 《魯迅全集》，第 3 卷，512 頁。

⁵ 朱光潛：《談美開場話》，《談美》，北京，開明書店，1932 年。

「雙重變奏」⁶，這雖然在文學研究的一定階段有其合理性，但實際上，啟蒙與救亡本來已經包含了 20 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思想內蘊，它們是現代化總目標下的基本的張力，卻不能說是唯一的矛盾。同樣，通過文學本體論排斥文學的文化因素來達到文學研究純潔化的目的，是另一個今天需要省思的誤區。這是因為，作為一個內涵繁複的概念，現代化本身並不是統一的，其中充斥著矛盾和悖論。由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命名所遵循的是與輪迴、循環的歷史觀念相對立的一種特殊的時間觀念，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歷史時間意識。這種時間觀念以現代／傳統、新／舊甚至文學／政治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處理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個案，以進化論的歷史觀念為研究的基礎，於是在建構一個獨立的文學領域或系統的同時，增加了它本身的歷史排斥性的功能，從而將大量的不符合這種時間意識和觀念模式的其他大量的文學實踐排斥了出去。因為較多考慮自身的文學性而犧牲、省略和放棄了文化研究的複雜性，研究界對 1937 年以後即現代文學後半期的認識和評價出現分歧，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作為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挫折，抗戰爆發嚴重挫傷了一個民族現代化的夢想，同時使民族主義情緒的普遍高漲成為現代文學這一時期發展中的顯著特徵。在這一情況下，文學的啟蒙對象及其目標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由抽象的個人轉向具體的社會大眾；個人的現代化開始讓位於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

⁶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走向未來》，1986 年創刊號。